

GRADU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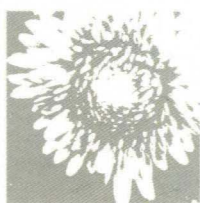
主编◎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导师丛书

全球化与 人文学术的现代性

王晓路◎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GRADU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主编◎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导师丛书

全球化与 人文学术的现代性

王晓路◎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现代性 / 王晓路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203-2460-1

I. ①全… II. ①王… III. ①人文科学-研究 IV. ①C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103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沈丁晨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37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	-----

上编：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书写

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现代性	
——文学研究的学理问题	(21)
文化地理与书写政治	
——以欧洲人对美洲的早期书写为例	(33)
地缘政治与文学研究	
——对时间序列研究范式的反思	(45)
意指实践与理论生产	
——外国文论研究的跨文化学理	(59)
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与中国文学理论	(71)
作为问题的全球化、生态批评与多元文化观	
——对外国文学认定式研究模式的质疑	(84)
事实·学理·洞察力	
——对外国文学传记式研究模式的质疑	(95)
比较的悖论与困扰	
——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思考	(104)

下编：文化视角中的批评范式

西方文论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115)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理论指向	(128)
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批评	(140)
文化批评：为何与何为	(153)
文化的界定与文艺研究	(163)
种族身份与种族话语之悖论	
——对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建构与解读范式的质疑	(174)
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种族与身体的权力场	(185)
表征理论与美国族裔书写	(197)
参考文献	(208)
后记	(223)

绪 论

这本文集是近年来的一些思考和写作，主要涉及文学和文化研究两个相互交叉的部分，现将这些文稿以历史语境和文化视角加以集中，作为笔者阶段性思考的呈现。由于人文学术脱离不了历史阶段和社会文化语境，因而其中各个分支领域，包括文学和文化理论，在构成知识形态的过程中均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一种合力的呈现与学理意义上的推进。这不仅是因为知识构成本身是一种话语实践^①，同时也是由话语实践的范围以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或不确定性规律所导致的。因为无论目前有关知识的哪一种分类方式，“不确定”似乎都是其中的一种共同规律，即便是最为“确定”并“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科学在当代科学界看来已内涵了诸多非常不确定的要素，“在他们看来，未来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平衡的状态只是例外情况，物质现象绝非处在平衡状态”^②。包括思想史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当然更不例外，福柯对此有着直接的论述：“描述思想史这样的学科的特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的对象不确定，没有明确的界限，使用的方法东拼西凑，步骤上既无正确性，也无固定性。”^③而作为对象的文学及文化文本，其生产、传播与接受总是随着社会文化、技术以及观念的变迁发生着变化。因而，具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既包含外在于文本的世界，也包括研究者主体的认知活动。所以，文学书写从来就是个体

①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5页。

②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王昶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前引书，第173页。

位于社会、文化结构中对其外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独特表征。由此，每一个个体都是历史性与社会性存在，每一个文本都有其时代性或历史性特征。刘勰所谓“时运交移，质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①讲的就是这种现象。

而对于这种复杂的艺术编码进行解读，寻求其中可能的意义或思想的轨迹，在批评实践中就必须对文本所涉及的要素进行综合性或不同侧面的把握，而不太可能采用单一的形式或直接套用某一种现成的理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文学和文化相互交叉的实践方式一直存在，只是时至当代，二者交织得更为紧密，同时受到了学界更多的关注并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洞察。英国学者沃尔弗雷斯就对21世纪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和其他话语及学科之间对话的重要性予以了说明。“尤其是人们注意到，科学、哲学和心理分析话语，正与文学和文化研究发生着交流，而批评者也在竭力探索文学与文本性通常要解决什么问题，而相对来说，这些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人开始研究。因此从批评行为的角度看，所涉及的对话问题旨在以超越传统界限的方式来面对作品阅读。”^②有鉴于此，在文学与文化领域获得大量实践的跨学科方法论并不是某种应景现象，而是这一学术方式的外在条件和内在逻辑使然。所以，近20年来，许多欧美高校的课程设置以及课程说明中也都将跨学科的倡导和训练纳入学科化的教学模式之中，其中一些传统必修课也增加了不同的文化视角。例如，剑桥和哈佛中最为传统的英文系在课程设置上均对此有所体现。^③

今天这个时代是急剧变化的历史阶段。“二战”之后的世界业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资源获取方式、生产、贸易、金融、管理、交易、技术普及所形成的通讯交互文化等等，都与战前不可同日而语。工业革命进程所达成的延伸自然人体力的技术方式已经过渡到协助自然人智力的阶段，这一信息时代的逼近使机器“制造”逐渐被人工智能型的“智造”所取代。这不仅带来了民族国家可以相互借鉴新的发展模式、彻底更新区域群体的生活方式与交流方式，与此同时，不同文化区域群体的主体性意识亦获得

① 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27页。

② [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③ 参见剑桥大学英文系学位课程设置与年度学术活动 (<http://www.english.cam.ac.uk>)，访问时间：2016年12月12日；哈佛大学英文系本科和研究生学位课程 (<http://english.fas.harvard.edu/courses/>)，访问时间：2016年12月12日。

了极大的提升。在思想层面,历史更是显示出了特有的复杂性。战争方式刺激了科技、战争后果刺激了哲学与文学,其结果导致人类的历史性境遇在社会科学及人文领域均受到了空前的关注。而在社会结构变化的状况下,经济与非经济要素以及两者所涵盖的范围几乎同时成为学界思考的话题,即“意识到作为抵抗对象的商品,其挪用本身随即被商品化,这种双向考察使得通过批判政治经济的社会经济分析,成为经由文化研究所开展的表征分析一个很好的同盟。然而这两个方面均维系了一种倾向,即它们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一种方法与经济结构有关,而另一种则与意义结构有关”^①。时代的特征,亦即社会文化现状,不仅影响到日常生活,而且总是会通过文本获得及时的、不同侧面的反映。文化作为一种通识性术语,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其他术语都不具有的表述便捷性和内在扩延性,而这一特征使其在现阶段显现出了独特的阐释功能,成为重要的关键词而备受关注。所谓“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社会/文化转向”,其实就是学界在这一阶段针对固有的社会人文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总体性描述。诸多学人开始通过文化这一新的理解及阐释方式,挖掘新的认识论入口,并通过“全球化”视角进行观照。

语言学转向似乎不再能提供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联,使之可以“应用”到特定的社会 and 地区。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髦术语,它把 1980 年代的政治动荡和超国家的经济秩序和大众媒体联系了起来,似乎处于当代变革的前沿,这个术语就是“全球化”。该词在 1980 年代晚期只限于国际金融市场和共同基金,到了 1990 年末,“全球化”已经成了最最热门的话题,不是作为理论范畴,而是向常规学科提出的一种经验主义挑战,特别是在人文学和美国的“地域研究”方面:东亚研究、南亚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东南亚研究、中东研究。在美国学术领域,这些是研究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地方,过去通常是比较文学的主要支持者。^②

① [美]托比·米勒主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页。

② [美]李湛恣:《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杨彩霞译,译林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23 页。

在这场重新审视固有学科领域的时代，与文本生产、传播和接受的“知识”或“常识”的合法性受到了关注，人们将文学文本置于一种历史性的空间范围，进行文学本身所内含的文化考古学，挖掘其中的非经济性的意义生产链。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法国思想家福柯，因为在他看来，“思想史的任务是要贯通那些现存的学科，研究和重新阐述它们。那么，与其说它构成了一个边缘的领域，不如说它构成一种分析的方式，一种透视法。它包揽科学、文学和哲学等历史领域……因此，思想史是一门起始和终止的学科，是模糊的连续性和归返的描述，是在历史的线性形式中发展的重建”^①。福柯这一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方式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各个分支都形成了直接的影响，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于既有知识结论、知识构成以及这种知识作用于社会结构中的认识，这一思潮也几乎同时影响到了文学的创作与批评。

与其他结构马克思主义者相似，福柯提供了一种认识论的决定论而非经济的决定论。他对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文明”巨变的观点更像韦伯，……合理性、规训、效率等原则已经取代了社会给犯罪、疯癫、疾病、文盲分类的方式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不仅工厂，还有监狱、精神病院、诊所、学校，出于工作和生产的目的，严格控制大众。福柯认为，这一切在一个大的过程中是彼此关联的，这个过程的标准是一套新的语言和意义体系。^②

自20世纪后半期伊始，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范式在社会思潮剧烈变动中也深受影响，研究的焦点和范围一直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最近数十年，西方文学批评界开始产生质变；传统以文本或作家经典为重心的批评方法，经过这些年的解构之后，现在逐渐扩散成为分门别类的、跨学科的方法。与此同时，文化批判或有更明显政治、思想诉求的文学批评也逐渐成为流行形式”^③。在目前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下，文学及文化中的思想

① [法]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4页。

② [美]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页。

③ 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5—56页。

内涵和知识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必然使文学和文化研究二者之间的交叉更为紧密。因此,人们不难看到,近期一些重要的理论著述和权威工具书均是将文学和文化二者结合起来讨论的,如《批评与文化理论的关键性命题》(*Key Issues in Critical & Cultural Theory*)、《理论初阶: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等等。一些权威的选集、指南和工具书,也都将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予以并置,构成思考问题的新起点,如《文学与文化理论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哥伦比亚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词典》(*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文学与批评理论词典》(*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文学理论选集》(*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和《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①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学界十分推崇的《布莱克韦尔文学理论指南》(*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在说明当代文学研究范围时重点分析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性,涉及研究范围包括了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种族研究、女性理论、性别研究、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研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②上述重要的学术成果也使人们看到,文学研究自“二战”以来产生了两种明显的跨界,其一是跨学科性,其二是跨文化或跨民族性。这种跨界并非只是指在文学书写或文学批评话语中拥有了更多的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以及多文化、多民族要素,而是研究

① Kate McGowan, *Key Issues in Critical & Cultural Theory*,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中译本: [英] 凯特·麦高恩:《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赵秀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Peter Barry,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Third Edition,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02, 2009. (中译本: [英] 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张一兵、周宪、周晓红、杨建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Michael Ryan, general editor, *The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Volume I, Gregory Castle, ed., *Literary Theory from 1900 to 1966*, Volume II, Robert Eaglestone, ed., *Literary Theory from 1966 to the Present*, Volume III, Keith Booker, ed., *Cultural Theory*. Wiley-Blackwell, 2011. Joseph Childers and Gary Hentzi, eds.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Michael Payne, et al., eds., *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Vincent B. Leitch, e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n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2010.

② See Gregory Castle, *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者的视野和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静态的文本中心地位已经开始动摇。这一点类似苏源熙（Haun Saussy）教授对比较文学学科化的分析，“文学与文化的‘跨民族性’维度得到了广泛承认，甚至不久前还怀疑比较学者浅薄无知的专家们也对此表示认同。‘跨学科性’成为资金申请和大学晋职表中可创造奇迹的关键词。‘理论’再也不是特殊身份的徽章或是声名狼藉的标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做理论，只不过有的做得多，有的做得少而已”^①。

中国人文学术自近代以降，步入了“西潮、古学、新知”相互交叉的学术现代进程之中，这种前所未有的交叉方式同时引发了中国人文学术现代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涉及学术性写作中“字无虚字”的规范性，而且主要是学界在思想、观点、立场等维度形成了关于器物、文化以及致用之学的反复讨论，可谓莫衷一是。

晚清人眼中的“西潮”，一如其关于“古学”的言说一样五花八门。反过来说，每个人心目中的“西潮”，往往与其关于“古学”的定义密不可分。……在国学与西学、信古与疑古、抵御西学与批判复古截然对立的论述框架中，很难平心静气地体会对方的合理之处。于是，兼采东学西学、超越非此即彼的言说，成为本世纪中国学者的最大愿望。^②

而这一场经久的学术及文化现代性的讨论不仅延续至今，同时也以其复杂性形成了当代学理认知和知识生产的特征，亦即这一学术方式是在不断承接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逐渐互为语境的框架中与西学长期交织的复合体，其中既包含了对自身学术文化的传承、过滤、自识与反思，同时也必须面对他者文化，不断对其进行筛选、甄别、引介、借鉴与批判。概言之，所有的先验性知识都是一种历史性的，是某种地方性经验的建构，“先验的知识不是那些可能从未说出的，或者从未真正地经过实验的真实性的先验的知识；而是指某个既定的历史，因为这是确实已说出的事物的先验的知识。……这种先验的知识脱离不了历史性，因为它不能在事件之

① [美] 苏源熙：《新鲜噩梦缝制的精致僵尸——关于文化基因、蜂房和自私的基因》，载苏源熙编《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任一鸣、陈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1页。

上并在静止的天空中构成超越时间的结构；它被确定为标志着某种话语实践的规则的整体”^①。有鉴于此，人文学术在总体上亦是一种历史性研究，即将未完成的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现象及解释性经验固化为相对静态的对象，进而从不同视角加以分析和阐释，这一点卡西尔在论述人文科学的逻辑时说得十分明确，“人类文化并非单纯地为被给予和单纯地为不言而自明的，相反地，人类文化乃是一种有待诠释的奇迹。但是，要从这一种印象导出—更深邃的自我反省（*tiefer Selbstbesinnung*），则人类不仅先要对这一种问题的提出感到有所需求和感到合理，并且还要进一步地去创立一些能够回答（*beantworten*）这些问题的独特的和自足的程序或‘方法’。”^②今天，学界在拥有多重资源和多重视角的历史阶段中，对于理论资源、学术议题和研究方法的观察、思考、定位与研究，在整体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仅在新时期学界所取得的成果、奠定的理论基础以及形成的论域，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人文学术的现代性还依然在路上，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有待持续。从知识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和方法是人文学术领域得以推进的焦点，而相关对象的前期研究成果则是该领域推进的起点。有鉴于此，学界在每一个历史时段中都非常有必要“向后看，向前走”^③。

如果说跨学科是人文学术方法论的必然，那么相关性就是人文学术结构性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知识形态是某种历史阶段中经验的集结，它与区域文化传统及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相关。而文化区域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文化现象，包括可识别的群体生活样式以及独特的学术样态，均与该时代的外部条件以及认知方式有关。从人类文明伊始，这些外部条件，包括区域群体在自然定位中的物理性条件，就决定了该族群适应性的生存方式，如对工具的选用、改进以及群体社会化生存所必需的组织方式等。而认知方式则与特定时期的支配方式以及相应的观念形态相关，二者决定了族群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文化特点。虽然历史是复杂的且现

① [法]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63—164 页。

②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 页。

③ Homi Bhabha. *Globalisation and Ambivalence*. (《全球化与纠结：霍米·巴巴读本》) 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从西天到中土：印度当代新思潮读本》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 页标题“向后看，向前走：对本土世界主义的注解”。

代人不能重返现场,但对于主要区域的文化发展,包括学术发展,学界分享着一些大致认同的观点。^①例如,中国早期族群的生存方式之一就与黄河流域的土质、耕作方式、工具、水利工程等要素有关。而对土地和水的刚性需求也直接导致了社会文化的早期样式,并且这一阶段依托家庭血缘、宗法等方式组织群体的生存活动也和其精神产品的内在规定性相一致。各文化区域的文化特质的形成都可追溯其早期外部的物理性条件,“盖自草昧社会进而至于开明,其中阶级甚多,必经若干年岁之蜕化,始渐即于完成。而后来社会之语言、文字、思想、制度,亦必仍有前此之迹象,蝉联寓伏于其中。由后推前,不难见其经过之迹也”^②。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性演进并非囿于自身语境之中的,而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不断交往、碰撞、汲取和融合的过程,其中线性的历史总是与网状的地方性文化以及外来文化交织在一起,包括一些文化“奠基”性或“常识”性传说的产生也是这样。例如,所谓的“盘古王开天地”一说就与印度传说有关:“今天民族学的研究,已知它是中国南方族群的故事,和印度传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在汉代以前未有盘古传说的记载。”^③应该说,一个时期的历史文化现象既包括了由其条件所决定的日常生活样式、自上而下的支配方式所带来的生存状态,也同时是群体在该时段适应性和创造性生存的结果。而其可识别的族群文化特征,包括语言、服饰、饮食、习俗和工艺等方面,也大多与外部世界的交往相关。这种相互交往和影响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在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④虽然人们对于古代社会文化的了解,只能依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进行互证和推断,但是,互为影响的方式在文化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则是得到学界认同的。^⑤

① 有关世界古代文明史参见 Chris Scarre and Brian M. Fagan, *Ancient Civilizations*, 4th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观点参见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②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③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④ 有关中国古代文化交流史参见何芳川《古代中西交流史话》,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有关中国古代日常生活文化史参见赵丰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开明出版社2014年版。有关中国古代食品史可以参见[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缨、刘东译,刘东审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有关服饰史参见沈从文主编《中国服饰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⑤ See “Introduction” in Peter Bogucki, e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8.

自太古至秦、汉，为吾国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时期。自汉以降，则为吾国文化中衰之时期。虽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继续演进，且社会事物，亦时有创造发明，足以证人民之进化者。然自全体观之，则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代之范围，种族衰弱，时呈扰乱分割之状。虽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异族同化与吾，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之三代、秦、汉相去远矣。^①

尽管古代群体之间、区域之间的交往或迁徙受制于地理区隔、战乱、宗教信仰等因素，在交往的规模、范围以及迁徙的路线等方面均十分有限且非常缓慢，但不同文化区域之间即便是断续的交往也会带来一种渐进的影响和深度的融合。因此，从自我认知过渡到互为认知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正是后者带来了认识扩延，因为互为认知既能相对客观地看到自己，也可以意识到他者对自身的感受。不同文化区域在持续的互识、交往和融合中，不仅通过食品、物品或器物带来了不同的经验和工艺样式，同时也促进了知识谱系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扩展，与此同时也扩大了认知图式。所以，文化史中不乏深度融合性的事件。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其社会治理的刚性需求，其传统知识系统的分类就围绕“经世致用”而展开，包括治世、信仰、实用杂学等相关门类，如儒学、儒教、道教、佛教类；医学、医药类；兵学、武学类；历法、地理、术数、数学类以及棋艺、工艺、茶艺、酿酒、农具、动物、植物、杂学等大类。后来陆续出现的一些古代百科知识类成果，如《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永乐大典》等，也是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汇总而成的，可惜其中许多只是留存的残篇，不能见其全貌。就中国古代知识样式和各时期知识生产的侧重点而言，又主要为六艺、先秦诸子学说、汉代经学及黄老术、魏晋南北朝玄学、隋唐佛教与经学统一、宋元明理学以及清代实学等。^②从总体上看，这样一种典型的古代知识结构与该区域的外部条件以及农业社会内部支配方式基本一致，同时又与历史时期支配阶层的理念和知识生产的主体有关，二者其实是合二为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和农业联结在一起，是和国家机构联结在一起，是和社会的统御运作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前引书，第345页。

② 参见林尹《中国学术思想大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联结在一起，却不与专业的知识联结在一起，尤其不和实用的知识联结在一起。这样的知识分子与文官体系不能分开。”^①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知识样态是自身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如远古时期的祭祀、礼乐等形式与论说、释义等教化方式形成了天命、德行等一系列围绕“天下”“江山社稷”与“经世致用”展开的观念形态和知识方式，然而，这一知识系统和发展与其文化演进的方式是一致的，也是一种与外部世界动态关联的结果。这一点学界多有精辟的论述^②，历史的复杂性也正在于此。所以，区域文化与局部知识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发展和相互影响相交叉的模式，因为“文化内在的发展和演变”导致一种文化成长，而“多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则往往形成一种文化的变迁^③。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其传统中就包含了内华夏、外诸夷的历史要素，而且是向外部世界逐渐展开的。“由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④这种相互影响的文化发展模式自近代以降更为明显了。

反观以工业革命为标识的现代欧洲，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改变的前提下，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裂变的最直接反映就是社会事务与家庭结构的逐渐分离，这导致了家庭血缘模式被社会契约模式所颠覆和瓦解，并在17世纪以后加快了二者置换的速度，“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如若没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因素就是：把事务与家庭分离开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⑤。所谓“前现代”（pre-modern）或“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等西方概念，即代表着某一社会从家庭、族群向社会转化并与其他区域形成互为结

①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② 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中华书局2011年版；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劳思光：《文化哲学讲演录》，刘国英编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④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⑤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12页。

构的阶段性过程。显然，这一发展模式是以技术—商业—社会要素为支撑所形成的商业政治，而这一社会化的历史进程又进一步在对海外市场的寻求中蔓延开来，并在其他文化区域施与了强制性复制，即以某种外部力量冲击其他非西方文化区域，形成一种显见的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现代性症候。需要说明的是，技术进步的速度总是大于社会的应对性调节，因此，我们看到从工业革命至福利制度的建立和规范性运行在欧美世界就经历了好几个世纪，至今依然随着技术和社会文化状况通过法律的修正案在不断调整之中。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欧美世界以社会契约型政治理念在型塑现代社会模式以及建立价值共同体的同时，不仅形成经济影响、资源配置产业链的组合与定位，而且通过其文化表征系统倡导并普及了自身的观念形态，由此生产出了一种文明等级观，并带来了“文明—野蛮”“先进—落后”“工业—农耕”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式的思维定式。“自从现代发端，现代科学在十七世纪兴起以来，这一时代的精神就自称将一切古代的成就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① 此等“先进性”致使后续民族国家必须以相类似的发展模式对其加以“认同”和“赶超”，并在此种认同和赶超中延续欧美世界的产业链、价格系统、成本核算等方式的同时，不断固化产业链中的组合及定位。由此，“先进”区域在经济手段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中获得利益最大化。在这样一种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纠葛之中，“先进与落后”引发的“赶超”性焦虑长期在后续发展中国家持续。而李约瑟关于中国至近代落后的问题也自然不断引发讨论，人们对此众说纷纭，其中“社会环境差异”说就是一种，“中华文明在16世纪前的优越与欧洲文明在16世纪后之优越，这两者的差别，李约瑟相信并非文明的天赋所致，正如他那一代人及其前辈所如此地认为，乃因形成两个社会的环境间的差异所致”。^② 当代学术赶超性现象及攀比心理实际上也是这一思维结构的惯性所致。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文化传统是历史性的，而文化发展亦是历史性的。其中，制度文化传统是可以根据发展阶段进行观察和借鉴。但在思想领域还需要厘清的是，文明方式与社会发展模式是否可以用同质化的方式加以论述？与此相关的是，对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明等级”观本身是否应当进行知识考古学的工作？某种区域或局部的历史经验

① [美]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② 卜正民、格里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台湾“国立”编译馆主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可否跨越时空直接作用于不同的区域？等等。这是因为，“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①。这种功利的背后隐含的是利益性意图或商业政治。所以，人类文明，包括制度文化，无疑是应当认真审视的。当代的种种“拿来”应当是一种过滤性的筛选以及依据自身条件的改用。因此，对任何一种标签式的“先进”或“新”，都需要特别的审视。与此同时，任何一种激进的、盲目的、比附性的观点往往也是不可取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界对此已经有了不少新的思考。“任何来自文明外部的冲击力量，不管它多么蛮横强暴，也必须经由文明内部的结构，才能如此这般地发挥出具体的作用。”^②多角度观察与思考是学术行为的前提，因而在文化史的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技术、管理和支配方式之外，思想先行者起到了很大的社会文化作用，可以说，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大体上是一种并置的关系。^③学术现代性问题也多源自于此。只是中国古代的“士”多以“天下为己任”，将“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看成他们独有责任。……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④。因而，一种文化区域所留存的文献往往构成某种文化精神，而相互借鉴的制度传统与之不断相互作用，并使该群体在借鉴和吸纳中得以组合成新的文化传统。所以，传统就成为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出于观念的需求对前述传统的不同解释。简言之，文献所内含的文化精神决定文化的品格，而制度进而形成的制度文化构成在历史时段中可识别的社会文化状态。所以，文化传统总是二者的统一，在此种意义上，认知与知识是一个问题两个侧面。在这一意义上，技术史与思想史是并行不悖的。

真正绵延至今而且时时影响着今天的生活的，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两种东西：一是几千年来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前人的智慧和辛劳积攒了许多生活的知识和技术，使后人得以现成享用，也使后来的人

① [美]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② 刘东：《进化与革命——现代中国的思想不变》，《读书》2016年第12期。

③ 参见[美]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等主编《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王加丰等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一章：罗歇·夏蒂耶：“思想史还是社会文化史？法国的轨迹”。

④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